

J292-09

X74

徐建融 李维琨 著

中国书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书法/徐建融,李维琨著.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中华文明书库系列丛书/叶长海主编)

ISBN 7-81046-448-5

I. 中… II. ①徐… ②李… III. 书法-美术史-中国 IV. J29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6896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责任编辑: 汪义群

印刷者: 江苏省丹阳市教育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875 插页 44 字数 294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 000 册

书 号: ISBN 7-81046-448-5/J·010

定 价: 30.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订)厂调换

第一章

中国书法导论



提起书法,人们很容易跟用毛笔写字联系起来。其实,书法有其悠久丰富、博大精深的内涵,完备的书学,包括书史、书论、书技诸多方面,决不是用“毛笔写字”的简单认识所能道尽。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唯有中国所有的一种艺术形式,它具有广泛的社会应用基础,同时又具有高雅的精英文化品质。

第一节 中国书法的起源

中国书法是与中国文字书写相关的一门艺术。汉字是世界上使用年代最为悠久的一种文字,它的每一个字都有单独的、方整的形体,都以其语音符号表达出一定的意义,而且,同样一个字可以组成自古至今、从北到南的无数辞语,这是汉字有别于它种文字的鲜明特征。古今流传的中国书法名迹,无不是与中国文字(汉字)、与如何写好这些文字密切相关的。但是,又应该指出,并不是通常一般的写字都是书法、所有传世的墨迹字本都等于书法作品。因为,书法还是一门艺术,它是书写实践经验积累到相当程度以后,人们将此实践向审美层面提升的产物。书法艺术是在实用功能之外更多具有美的意念的艺术作品。也就是说,并不是汉字一诞生就有了书法艺术。汉字的象形化、结构多变的形态本身就很有艺术性,但在书写时的追求,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发展过程;而且,汉字曾经历过从古文、篆隶到草、楷、行等字体的演变,随着对各种书写规律认识的深化,人们对各体书的艺术性的主动探求也日益增长,书法的艺术表现及其内涵亦日趋多样充实。可见,要想懂得中国书法,正像考察一条河流必须不畏艰辛去长途跋涉探寻源头一样,了解一些有关中国文字的起源及相关知识也是很有必要的。

跟世界上一些文明悠远的民族一样,在文字发明之前,华夏民族也有“结绳记事”的史载,比如《易·系辞》就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物原》讲得更详细一点:“燧人氏作绳,盖上古未有文字,大事则大结其绳,小事小结其绳。至太昊始易以书契也。”中国文字起源很神秘的“龟字效灵”、“龙图呈宝”等传说,意

思是先祖轩辕在洛水接受神龟负的九畴书、在黄河接受龙马负的八卦图,才开始有赤文篆字辨天识事。史传最集中的是仓颉造字之说,相传他是黄帝的史官,是将世间流布的文字整理出来的著名人物;《春秋纬元命苞》中说他“生而能书,及受河图洛字,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

文字起源亦即文明的重要起源之一。在中国,与有巢氏造屋、神农氏尝百草始“稼穡”、燧人氏“取火”的传说相似,仓颉造字的故事为中国文字的诞生增添了几分神圣而崇高的色彩。



图1 大汶口文化
彩陶刻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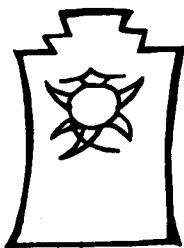


图2 良渚文化
玉璧刻符

近代考古研究的材料表明,原始社会的先民在开发自然和农耕生活中出于记事与交流的需要,确实是先用结绳刻契的办法。后来世事日繁,便出现了用刻画符号记载事物的情形(距今约5000-6000年)。比如20世纪50-70年代出土的半坡文化“人面鱼纹彩陶盆”(西

安)、仰韶文化“鹳鱼石斧彩陶瓮”(河南临汝)等,反映出当时图腾崇拜的风俗,其中的纹样不单是“寓人于鱼”的心理写照,而且被一些考古学家、文字学家认为已具有了文字的性质。在半坡仰韶遗址一处,还发现了原始社会晚期彩陶器具上的契刻符号113个,而属于大汶口文化的一个刻画符号(图1),于省吾释为“旦”字,是迄今发现的更明确的早期文字遗迹之一。南方良渚文化的玉璧刻符(图2),也是显著例子之一。研究者仔细考察了这些出土实物后认为,当时刻画线条的深度、长度以及交叉组构方面,已有若干对称、均衡的意味,而且从左向右、自上而下的笔法也很有规律,从中

可以窥见与日后成熟书法的某种密切的渊源关系。但这些刻符或者字迹,还只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原始形态或最初雏形。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河南安阳县小屯村的殷商故都发现了一批甲骨文,它们的问世及其研究成果的发表,是中国文字、书法乃至文明史的大事,震惊了世界。这些文字,大都是在龟甲或兽骨上用尖利的工具契刻的,有的是刻完后再填入朱砂,也有用类似毛笔所写的墨书或漆书文字,所以通称甲骨文。殷商统治阶级十分迷信,凡事都要占卜,有的还达数次,像祭祀、征战、田猎、收成或者分娩……都要经过甲骨卜占求命于神,这些文字就是从殷王盘庚至殷商亡国 273 年间王室的记事(卜辞)。

说起这些文字的发现,还有一段故事。当时任职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正患病在家,仆人从北京宣武门外一家中药铺买回的药材中,被他发现一味“龙骨”上刻着如篆文一般的细小文字。王是一位学有专长的金石学家,马上派人仔细打听后,又买回一批龙骨。经他考订,这批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终于重见天日。1904 年,学者孙诒让所写的《契文举例》是最早一部考释甲骨文的专著;后来,董作宾撰写《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又详尽地考定了甲骨文五个不同时期的风格特征。甲骨文的发现改写了传统书学的陈说,因为此前向来认为中国书法的实物遗存是以三代的钟鼎文为嚆矢的。

甲骨文已经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古文字体系,它们在使用方面还残留着原始氏族社会的陶器生产以及殷商人习喜占卜问卦风俗的痕迹。在拼写方面,因为甲骨和兽骨比较坚硬,所以契刻而成的文字笔画以直线为多,长短参差,略显纤细,方折笔划则刚劲挺拔。后来随着技巧的熟练加上追求美化,出现了粗壮丰腴、弯弧遒韧等修饰,也有相异的趣味表现。

大约在公元前 20 世纪的夏代,中国就开始了青铜器的冶炼和铸造,到商周两代形成了灿烂的青铜文化的高峰。当时作为祭祀、

典仪、册命、征伐、赏赐众多用途的青铜器上，都带有一定的铭文，原先只是作为器主族氏的标志，每器只铸刻四五字，至多不超过数十字，如殷商末年的“四祀邕其卣”不过 8 行 42 字；但到西周初年，已有飞快发展，如“何尊”12 行 122 字，“大盂鼎”19 行 292 字。因为这些文字都是铸造（也有少量篆刻）在青铜器上的，一般都称为“金文”；而青铜器中，又以祭祀用的乐器“钟”和食具“鼎”为代表性的重器，所以人们习惯上又将金文称作“钟鼎文”。由于青铜工艺的成熟发达，金文也日益精美圆浑，不单出现了朴茂、雄劲、优雅等不同的书风，而且在笔画、间架与字里行间，形成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用笔、结构与章法上的基本格局。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的局面有利于突破文化专制和文化垄断。南方吴、越、楚诸国的金文出现了夸张装饰化的“蝌蚪文”、“鸟虫书”，后人把这些与当时秦国有差别的文字称为“古文”。那么，当时秦国的文字又是怎样的呢？如果看一看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十个圆桌般的鼓状石墩四周所刻的文字我们就会有所了解了。这些文字记载了战国时期秦国统治者的功绩，字体比较规整，运笔起止都用藏锋，浑朴含蓄，结构也比较规整，基本上看不出象形图画痕迹，朝符号化方块字的发展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采用“车同轨、书同文”的政策，统一了度量衡。他在统一文字方面也作出了重大举措：废除原六国通行的古文、金文而用小篆（将秦国的文字稍作简化、规范）作为全国通行的标准字体。从出土的一批秦代“权量”（度量）和“诏版”（官方文书）上，我们可以见到这种疏落匀停、圆劲转折的规整文字的普遍运用。当时由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都用了经改革后的文字，而相传李斯手书的《泰山刻石》、《琅琊刻石》，端庄圆浑朴茂，笔画粗细基本一致，字体略长，人们又称之为“玉筋篆”，历来认

为是标准的小篆书体。

秦代字体的另一项重大改革,是隶书的推行。传说下层官吏程邈为了加速文牍的书写速度,变小篆的圆形为方形,曲笔为直行,并吸引了部分俗体字,于是,纵有行、横无列、比较自然草率的隶书便问世了。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2000余枚墨书竹简(实际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秦国文献),其字体所显示的篆书结构与粗细有间的隶书笔意混合交叉的特点,已表明它们是由篆向隶过渡期间的产物。

西汉初年,书法又经历了一个得以梳理、倡导的阶段,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秦隶变成了汉隶,也就是由略有波形的粗细变化、体态逐渐趋于扁横方形、笔画出现波磔、撇捺向背展开之势。汉隶的成熟大约在西汉中期。至此,汉字书法完全脱离了象形的桎梏,美化和抒情的实用性已成为其内在的主要动力。现今出土的不胜枚举的两汉简帛书法和数以千计的碑碣及其拓本,向我们呈现出其千姿百态的绚烂面貌。

草书是从章草起始的。今人所谓的“章草”,也就是规范化的隶草的起源,现在学术界的说法不一。有人认为自西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就开始了;有的则认为东汉章帝特准杜度以此书作奏章,以后便通行起来。汉代学者许慎所说的“汉兴有草书”,讲到了一种艺术现象的历史背景。像一切艺术一样,中国书法由实用向审美的提升有一个过程,通常是经由民间到官方经文人,由不规范而规范、由俗而雅的途径。图画缘于识别事物的需要,而舞蹈则起源于巫术的礼节。书法艺术也是从文字书字的实用功能开始的。草书的产生首先是社会上对书写简捷快速的需求。东汉年间出现的学习隶草的字帖“急就章”,就是民间率先流行起来的“俗体”,以后才出现由章草发展而来的今草。

从传世三国时代吴国名家皇象所书的《急就章》来看,除其结体像隶书仍为扁平端正、横画有波磔之外,已经简省了许多转折。

为简便快速,只求大体的轮廓,字与字之间虽然没有连绵之笔,但字迹笔画已有连结。大约在汉代末年,楷书已经出现,从传世魏晋时期的《天发神讖碑》(传吴皇象)、《贺克捷表》(传魏钟繇)、《爨宝子碑》,都表明楷书脱胎于隶书,但改变书写的笔势,又有进一步的规范和简化。楷书书写速度比隶书便捷,又比草书容易辨识,很快便成为日常应用的流行书体。至于介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行书,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说是“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

由此看来,中国书法的篆、隶、草、楷、行五种书体,经三代至魏晋已经大体齐备了,日后中国书法的发展衍变,基本上就是在五体范畴之内,遵循着书家的个性化表现与艺术性探索而演化的。追溯这五种书体的确立,有两点启示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一是秦隶的历史坐标。秦代的大篆虽然是官方通行的标准,但民间与下层官吏主要都是用隶书,秦隶改变了甲骨、钟鼎等文字的古奥诡异,它打破篆书结构,用笔变圆为方,改曲线为直线,省繁就简,大大便利了实用书写。后来的草、楷、行书基本都是在隶书的基础上改革而来的。

二是甲骨、钟鼎文的艺术魅力。用刀或利器镌刻(熔铸)与用毛笔书写呈现出判然异趣的韵味,当历经一千余年的帖学越过其高峰,清代一批书家重新将目光投向远古,追求“金石味”一下成为时尚的革新。这种审美趣味的变异,大概可以算是艺术创作发展的一种惯例了。

上文提到,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其中有许多是象形字,比如𠂔和𠂔,已经表现出对自然山水形象特征的高度概括和形象模拟:山峰雄伟挺拔而静止,水流则柔和而运动。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所指出的“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和“假借”是汉字构筑字形的主要方法,后世称为“六书”,而“象形”正是“六书”中的关键,所以后人又有“书画同源”

之说。

所谓“指事”，是人类发明文字的第一要义。由简单到繁复，结果发现光结绳不足以纪事了，于是就用一两个抽象符号，或在象形成分上添加点画抽象符号，指出事物的状态，凡看见字就能明白其代表的意思，比如“上下”、“一二”、“本末”等等。而“象形”更是造字的最初方法，今人所知道的“日”、“月”、“山”、“水”等诸多名词，仿佛用线条勾画出物体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形象，使人一目了然。“形声”是指复合组成的字，一般由一个象形字（形符）和另一个声符字组成，前者表示字义，后者只是取其读音。比如“江”、“河”，就是取水的象形，又分别取“工”和“可”的音韵。“会意”也以象形为基础，比如“武”字，是止（步）戈（伐）组合而成，步伐整齐则军令森严，“武”的涵义不释自明，再比如“信”字，是寓有人说说的话可以取信的意思。“转注”的本义比较复杂一点，原是指意义相同、音也相近的字可以互相为用，比如“老”为“寿”、“巨”为“大”、“照”为“明”。而“假借”之与“转注”，犹如算术中的正负数，有转注，文字乃多，有假借，造字则受到了控制，比如“令”，本义是号令，结果引申出发号令的人就称为“令”，如令尹、中书令、县令，又比如“长”，原指长短的长，可以引申出长幼之长、长官之长。

章太炎曾著《小学概说》阐释“六书”，他概括道：“转注、假借，就字之关系而言；指事、象形、会意、形声，就字之个体而言。虽一讲个体，一讲关联，要皆与造字有关。”中国汉字从汉代《说文解字》9,300余字之总数到清代《康熙字典》已收入47,000余字，而到20世纪80年代的《汉语大词典》已收词语375,000余条，实践发展丰富了中华文字宝库。但无论如何浩繁缤纷，大致都是按上述六种规则造出来的。我们要了解中国书法，略知一点中国文字的构字规律，对于把握书法艺术性的内涵及书法家的创造性，是很有必要的铺垫和补充。

笔墨纸砚，又称“文房四宝”，是旧时中国文人不可须臾离开的

物件,它不单表明当时文人的地位身份,对书法创作的艺术效果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甲骨文中,笔写作“𠄎”,就像用手执笔的样子,这就是古代的“笔”字,繁体字的“筆”字是后起的,模样就像竹制的笔管,笔端却是用兽毛做成的。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中,许多彩陶纹样的图绘都显出清晰流丽的线画,可以想见,当时已经有了类似毛笔一样的工具,写起来能圆能方,曲直自如,铺毫提锋,富有弹性。湖南长沙左家山、河南信阳长关台等地战国楚墓的发掘报告提到了出土毛笔,可能是迄今所知最早的考古发现。这些笔有竹管,经过髹漆,再用麻丝将兔箭毛包裹在竹竿外围,形成尖挺的笔锋。史载秦国大将蒙恬制笔以鹿毛为柱,羊毫为被,以木为管,工艺已经比较成熟了。魏晋时期,最享盛名的是安徽宣城的紫毫兔毛笔,笔锋挺拔耐用。唐代出现了锋长势柔的毛笔,引来了唐季书法纵横自如的崭新风尚。元代以降,浙江湖州地区用山羊毛、野兔毛或者黄鼠狼毛,经七十多道工序精制而成具备“尖、齐、圆、健”特色的湖笔,其盛名至今不见衰退。所谓“尖、齐、圆、健”,以后就被喻为笔之“四德”。意思是笔头要尖细,化开后笔毛均齐无长短,周身浑圆无低陷凹凸,即使用毛笔在手指上打圈子,没有任何涩滞而能富有弹性。这跟我们今天所用的硬笔(钢笔、铅笔、圆珠笔)比较起来,写字效果明显不同。

经久历岁的书写实践,使执笔方法也形成了严格的规则,如唐代陆希声总结的“趯、伸、勾、格、抵”的“五指执笔法”,还有“拨镫法”、“把笔五种”(执管、握管、摄管、握管、搦管)等等。今天我们了解并整理这些遗产,其中不乏古人的临池心得,但也不免有些故作深奥、故弄玄虚的东西。传说东晋王献之七八岁练字时,其父王羲之趁其不备,想从背后抽掉他手中的笔,结果因他执笔得法,未能如愿,便赞叹他日后必享大名。这类故事过分强调了方法,不免就像神话了。

中国书法有朱书也有墨书，而以墨书的应用更为广泛。墨主要有松烟和油烟两种，松烟是用松树枝烧烟，经过漂、筛，再配上皮胶和麝香、冰片等香料制成，这种墨黝黑但少光泽；而油烟则主要用桐油之类脂油烧烟再加入胶和香料制成，质地细腻，坚韧发亮。古人一般不用隔夜的“宿墨”，在写字之前，正襟危坐，在洗净的砚台上一边磨墨，一边仔细地读帖，琢磨范本上笔画的妙谛，进入一种很专心致志的境界，等到读帖有了体会，墨也恰巧磨好了。

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用墨？据考证，商代占卜所用的龟甲上有墨或朱色书写的文字，文献中也有商人用墨给罪犯脸上刺字的记载，谓之“黥面”。汉代出现了人工制造的烟墨，有了统一的墨模，生产的墨锭就比较规整了。传说三国时魏将韦诞善于制墨，不单精致，而且“百年如石，一点如漆”，质量很高。唐代“徽墨”声誉日隆，匠师不仅讲究造型、题识，并且大大改进了调胶捣松的技术。宋代在松烟墨的基础上，发明了油烟墨。明清两代的造墨业更加发达，时人用“坚而有光，黝而能润，舔笔不胶，入纸不晕”来称赞它。书画家对于墨的质量十分讲究，他们要求在运笔挥毫之间，墨质滑润，挥洒在绢帛纸张之上，深浅浓淡、枯湿变化能运用自如，得心应手，完成后要求作品墨色保持不变。我们今天鉴赏一些名家的墨迹原作，除了赞叹书家的气魄笔力之外，依然可见其墨色沉着，熠熠生光。当时新添的品种除了供观赏用的“集锦墨”争奇斗胜之外，用天然颜料制成的绘画用彩色套墨也很别致。至于明代安徽两家著名制墨名家的《程氏（君房）墨苑》和《方氏（于鲁）墨谱》，更为后人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墨式图谱。

今天所见到的古代书法名作，并不都是纸质的，因为早期的书法作品是使用甲骨、青铜这些特殊的载体，甚至包括石鼓、竹简、木牍、帛书、碑版、砖瓦等等。然而，纸张作为中国书法中最重要的一种载体，它的价值决不是其他载体所能取代的。

造纸术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它的出

现,为人们记事交流、艺术创作、传播文化提供了一种简便经济的材料。传说东汉元兴元年(105)左右,蔡伦用寻常易得的多种纤维造纸,改进了造纸方法,人称“蔡侯纸”。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西晋陆机《平复帖》墨迹,是传世最早的麻纸本法书。后来除麻皮之外,楮皮、桑皮、藤皮、竹类等都成为造纸的原料。驰名中外的宣纸产生于唐代,它是用青檀树皮为主要原料,因产于安徽宣城而得名的。宣纸质地坚柔,结构紧密,洁白匀整,水注日晒不易变色,有“纸寿千年”的美誉。吸墨性能好,尤其适合中国书画的笔墨表现。明清之后,造纸业更发达,有了玉版笺、罗纹纸、夹贡等更多品种,还有河南禹县的布纸,湖南莱阳的绵纸等各种特种纸。相传王羲之写《兰亭序》用的是雪白光亮的蚕茧纸,而硬黄纸是一种有名的染色纸,加浆加蜡,使之坚厚韧滑,再染以药汁变成黄色,这种纸防蛀防水,抗霉烂,很适于写经。宋代印刷术繁盛之后,适于印书的竹纸十分盛行。许多碑额的拓本,用的多是宣纸。而像《鸭头丸帖》(王献之)、《苦笋帖》(怀素)等却是写在绢素底本上的。

早期人们挥毫写字并不讲究研墨舔笔用的砚台,古代用铜、铁、陶、石等不同物质制作的砚台都有,但越到后来越考究起来。大约隋代以后,文人特别喜欢使用石砚,因为品质好的石砚具有坚实、温润、发墨而不伤笔的优点。而且砚台从天然的石矿采出,本身还具有各种不假人工的色泽与美妙无比的纹理,像著名的出于广东肇庆端溪的端砚就有鱼脑冻、蕉叶白、冰纹等纹理。再加上后来加工雕饰的日益繁多,原本朴实的矩形或圆形砚石经制砚名手的加工,被刻出山水、花鸟等各式立体图案,好事者又将历代名砚编成各种图谱,如《砚史》(宋米芾)、《西清砚谱》(清于敏中)、《西园砚史》(清高凤翰)等,实用的砚台就演变成一种供收藏、鉴赏的玩物了。中国古砚最负盛名的除上述的端砚外,还有江西婺源龙尾山(古属歙州)的歙砚、山东维坊、淄博的鲁砚和甘肃甘南临洮的洮砚,并称中国四大名砚。

介绍了与书法密切相关的用具之后,再说一下有关帖与碑的知识。

帖原指古代人往来的信札、便条等书写墨迹,后泛指以书法为目的重新传摹在石版或者木板上,进行翻刻复制保存的书法作品。比如较早有唐太宗时汇集王羲之书札刻成的《十七帖》,嗣后规模更大的有宋太宗时所汇刻的《淳化阁帖》等等。而碑是指旨在祭祀、纪功而刻在石碑、摩崖、造像或者墓志上的文字,因树碑之风盛行于汉、魏、唐三代,所以通常盛称的有汉碑如《张迁碑》、魏碑如《郑文公碑》、唐碑如《神策军碑》等。此类石刻文字,其创作过程大体先由书家写毕,因有的书家是直接用朱色写于碑面的,故又称“书丹”,再由刻工依此笔迹镌刻,后人见到的,则大多是专门从原碑上拓摹下来的拓片。由于加工和保存上的种种因素,比如帖的临摹刻印的粗细、文野,碑的雨淋日晒的自然侵蚀等,帖与碑呈现出十分鲜明的不同意趣。清代中后期,书坛曾有过一场激烈的“尊碑卑帖”的书法改革运动,他们把魏晋的书家分为北派和南派,北碑而南帖,也就是推崇碑学派,贬抑帖学派。

第二节 中国书法的特点

若用音乐、舞蹈或者建筑、绘画作类比的话,书法具有时间、空间艺术的诸多特点,比如像乐音一般的节奏韵律,或者像图画一般的虚实、疏密、浓淡和线条的律动感,等等,以致有的学者(如宗白华)认为其可以代替建筑在西方艺术史中的位置,因为书法风格的变迁基本上能够折射出我国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艺术的总的风格。然而,我们在这里谈的主要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生活的书法的地位、

作用及其与传统审美心理习惯方面的关系等特点。

一、经世致用的习惯制度

街头商家的店招，酒肆茶楼的幌子，既是作生意广告，又是为了炫耀名气，当然包括为其题写的书家名气。普通百姓迎春要挂春联，平时居家日用油盐酱醋的流水账，彼此往来问候的信札，更是离不开手写的书法。我们知道，一些传世的名人法帖，也留有这种家常性的烙印，比如王献之的《鸭头丸帖》，就是他评论中药、约见朋友的便条；西晋陆机的《平复帖》，讲的是亲友间问候病痛康复之事；唐代怀素的《苦笋帖》，不过“苦笋及茗极佳，乃可径来，怀素白”13个字；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连署名也只有24个字。这些名迹，当时都是极其普通的信札，不期工而自然工，流露出天然的逸趣和日积月累的功力。

在长达二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书法在正统官方的祭祀、征战、分封、婚丧礼仪等社会体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礼记》解说青铜器的铭文，也就是今天人们所看到的那些钟鼎文的用途，是为了“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简而言之，也就是为了向后人炫耀祖先的功德。一些著名的碑石是典仪的重器，比如今已佚失的《诅楚文》相传是公元前326年的文物，当时秦惠文王向巫咸大神诅咒楚王，将此文刻石然后沉埋，后来被宋人发掘才得以重见天日。

东汉初年盛行厚葬，碑碣云起，墓碑与祠庙刻石层出不穷，如《张迁碑》、《鲜于璜碑》等。另外也有一些专为修水利、筑道路等工程记事的刻石，如《石门颂》、《褒斜道》等。北朝除碑额、摩崖外，还出现了许多造像记、墓志，著名的有《龙门二十品》、《嵩高灵庙碑》、《郑文公碑》等。唐代文治武功极盛，树碑之风更加流行，碑文一般都有撰写者和书丹人的姓名，著名文学家应邀撰碑文，著名书法家应邀写碑书，几乎应接不暇。据史料记载，李邕写碑约有30多通，

颜真卿 90 多通,柳公权 60 多通,李阳冰 30-40 通,当时的社会风气由此可见一斑。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古代教育与踏上仕途的必要内容之一,书法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早在周朝,《周礼》列述的“礼、乐、射、御、书、教”六艺中,识字习书就是一项主要科目。西汉初年,丞相萧何制定了《草率》,又规定了八体书为学童应试的内容,成绩优秀者,可以担当作文书工作的尚书史、书令史;《尉律》还定下了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的章程。唐代设立了专门培养书法人才的“书学”,是与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律学、算学并称的六个最高学府之一。当时明确规定必须“楷法遒美”才能入仕,可见对书法的重视程度。自唐以降的科举中,凡经乡试、会试、殿试的考生不论文章如何高明,书法却是马虎不得的。这在后世成了一种自觉的制度,如明代的文徵明、董其昌都是因为在学校或应试中被认为书法不佳,因而奋发临池而成为著名书家的。学而优则仕,而判定学优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便是书法,因而书优也能当官。明成祖喜欢沈度的字,誉之为“我朝王羲之”,他在位时编《永乐大典》,宫中参与缮写者有 2,100 多人,无论监生、布衣,只要书体近沈氏的都能召任,有的还被封为中书舍人。这样,书法就成为他们安身立命、求取功名的法宝了,一时“云间二沈”(沈度、沈粲)的书法风靡天下。清代康熙皇帝崇尚董其昌之书,当时朝野盛兴玄宰体;到乾隆又喜欢赵孟頫的书法了,“欧里赵面”的馆阁体大行其道。这其中,也透露出中国书学文化的一个侧面。

还有,《千字文》现象也很能说明问题。当年梁武帝命周兴嗣将征集到的王羲之遗书汇总,编成无一字重复的四字韵书《千字文》。记载说周兴嗣为此“一夕须发尽白,谓心力集于此书”。《千字文》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天文、地理、历史、道德诸多方面,容易读记,很快就成为识字的启蒙课本,也成为习书者乐于临写的范本。隋僧智永曾拓写了 800 本《千字文》,送给江淮各